

走过伤心地

张雅文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引子 《向命运宣战的奋进者》	3
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1.....	6
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2.....	13
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3.....	21
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4.....	30
走过伤心地 1.....	36
走过伤心地 2.....	47
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 1.....	56
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 2.....	66
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 1.....	74
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 2.....	83
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 3.....	92
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 4.....	101
放下你的猎枪 1.....	112
放下你的猎枪 2.....	117
《生命的呐喊》（节选） 1.....	123
《生命的呐喊》（节选） 2.....	133
《生命的呐喊》（节选） 3.....	142
《生命的呐喊》（节选） 4.....	148
《生命的呐喊》（节选） 5.....	155
追梦人生（后记）	167

引子 《向命运宣战的奋进者》

何西来

我认识张雅文好多年了，但真正了解她的风雨人生，却是读了她的自传《生命的呐喊》之后。这部作品使我这个早已年逾古稀，并且颇经历过几番人世沧桑和盛衰荣辱的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这部自传里，雅文用率真而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出生在偏僻荒凉只有一户人家山沟里的女孩子的命运以及她此后几十年的奋斗。为了心中那份崇高的理想，她不断向命运宣战，与命运抗争，以生命做抵押去争取更高的人生境界。她用自己的笔，如实地记录了这个不断向上攀登的坎坷历程。

童年，为了读书她哭着喊着宁可被狼吃了也要去上学；十五岁时她又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一头跑进体工队当上一名专业速滑运动员，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三十五岁时她又疯狂地爱上文学，一心想当作家，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最终成为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国家政府津贴享受者，黑龙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登上了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她的文学创作领域涉及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及电视剧本创作等多个门类，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几乎家喻户晓，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她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才气，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海外华人题材的领域。她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跨国之恋》、《打到车臣总统府的官司》等，都是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的海外华人、华侨题材的作品。

雅文并不是一个幸运儿，她的点滴成功的取得，都伴随着血和泪。

我曾开玩笑说：“雅文，在你这一生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你都不会走到今天！”

的确，她有苦难的险些被狼吃掉的童年，有过被伤病摧残的少年，有过受到蛮不讲理的领导压制，遭遇过几乎让她丢掉性命的著作权恶意侵权官司的中年。可以说在她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伴随着生与死、取与舍的考验。正是她那不肯服输的刚强个性，使她一次又一次闯过了生死大关，顽强地闯到了今天。如果没有倔犟的个性，没有聪颖的资质，等待她的必定是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重复了千百年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可贵的是，她为了心中那份美好的理想，以宣战的姿态迎接命运的挑战，一次次地冲出绝境，闯出一条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道路！《生命的呐喊》是她在心脏搭完六个桥的重症监护室里动意构思的。一个如此顽强的生命是不可战胜的。

苦难可以使弱者颓唐和消沉，苦难却是强者和智者奋发进取的动力和财富。雅文正是这样一个强者和智者。她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艰难困顿中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不认输、不言败的女性形象。她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一颗不安定的心。她是一个胸怀大志、志存高远的人，不愿也不可能某一点上故步自封扬扬得意，而是不断将自己向更高的人生境界提升。

这种进取精神和奋斗意识正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的极其可贵的品格。

这就是《生命的呐喊》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她不只在为自己和跟自己一样的在逆境中、在苦难和挫折中奋进的生命呐喊，而且是为一种强韧不屈、刚毅劲健的民族精神在呐喊！如果我们仅仅把《生命的呐喊》看做个人反抗命运不公的倾诉，那就低估了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也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生命的呐喊》中的张雅文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当代知识女性的艺术典型，她代表的不是她个人，而是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广大知识女性。

雅文是一个单纯、开朗、正直而热情奔放的人。

无论是她的为人，还是为文，都表现出一种真诚而激情四射的个性，表现出一种社会良知及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流露出一种弥足珍贵的平民意识和悲悯情怀。她不媚上，不卑下，从不为了取悦什么去写作，即便歌颂崇高伟大的人物，在挖掘人物闪光点的同时，也能以深邃而敏锐的目光探寻着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更深层的思想内涵。在《四万：四百万的牵挂》这篇报告文学里，她讴歌了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用精湛的医技拯救着人类的生命，用圣洁的心灵净化着社会人群的精神境界。同时，她的笔墨也拓展到更深层的、关系到家家户户切身利益的中国医疗改革，触及到中国医疗腐败等诸多体制性的弊端。在她心脏搭桥手术成功之后，她想到的并不只是她个人获得了新生，而是成千上万无钱就医的心脏病患者仍然挣扎在生死线上，体现出一个作家和主人公刘晓程共有的悲悯情怀及崇高境界。她珍爱自己的生命，推己及人，也珍爱更多的弱势群体、下层民众的生命。

《走过伤心地》写的是傻子屯的党支部书记许振中带领全村傻子改变命运的先进事迹。但这部作品并没有止步于好人好事的书写，而是更进一步揭示出导致傻子屯形成的真正原因，揭示出人类的愚昧和社会的冷漠，以及先进人物的自我救赎、社会松绑等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

雅文深情而又不无愤激地写道：“一个改变了傻子屯命运的先进人物，全村都富了，他自己家却穷得叮当响，老婆孩子多次自杀未遂。他拯救了全村，唯独没有拯救自己家。他解放了‘全人类’，唯独没有解放自己。多少人摇过许振中这面大旗，现在大旗摇秃了，只摇剩下一根旗杆，多少人戴过这朵大红花，现在花蔫了，快枯萎了。从社会发展与社会价值来看，苦了他一个救活一个村，许振中的确应该奉献，当今中国太需要奉献了。但是，欣赏这种流血的奉献，不能不令人觉得泯灭了什么！我不禁斗胆发问：这就是一个先进、典型、优秀党员的下场吗？当今有多少这样傻乎乎的奉献者？先进典型是天生为某种人为光环的苦行僧殉道士吗？不，他们同样是精英，是国粹，是栋梁，是国家之财富，是没有被铜臭熏臭的高贵灵魂！我不知我的典型自救论能否得到许振中及众多典型的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报告文学集中，雅文还选入了三篇有关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走过伤心地》、《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放下你的猎枪》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这在当时是很有前沿性的题材。三篇作品分别是写人与水土、人与树木、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以此来呼唤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和不要肆意摧残、践踏其他物种及环境的生态伦理。

《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是雅文独闯俄罗斯时获取的素材。写的是在极左年代一个献身科学的青年被判刑、被逼出逃的悲惨命运，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主题，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个人无法超越时代，更无法超越历史。雅文看到了个体生命在历史面前的太多的无奈与悲哀，她呼唤着良知，呼唤人类爱好和平，尊重人的权益，不要践踏无辜的生命。

张雅文不是一个玩文学的人，她视文学为生命，对文学怀着一种崇高的敬畏之心。她对创作，对人生，怀有火一般的激情，而且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每每谈起文学，谈起创作，她就瞪大那双并不年轻，但却像孩子般单纯、好奇、探求的眼睛，闪动着渴求的光芒。她渴望得到交谈者对其作品提出宝贵意见，渴望得到赐教。这种求知心理和谦虚态度，是她个性中非常宝贵的特质。正因有了这种出于至诚而非作秀的特质，她的创作才不断进步。她懂得踏

着贤者、智者的步伐前进。而且，她耐得住寂寞，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关就是几年，不为窗外的花红柳绿所诱惑，不为点滴荣誉所蛊惑，这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是十分难得的。

我相信，一个作家去掉了浮躁，就会像“洗尽铅华见雪肌”的梅花那样，留下的是幽香，是沉静，是凌霜傲雪的骨魂。这才是人和文的真境，雅文其勉之！

2011.1.22.写于六砚斋

注：何西来，著名文学评论家，曾任《文学评论》主编。

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1

——高官厚禄拴不住的心灵

亲爱的读者，在我上手术台之前，我要把我所采访、所亲历的一切告诉你们，希望中国几百万像我一样徘徊于生命边缘的心脏病同胞能认识他——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

愿上帝赐我神来之笔，否则我将有愧于我的主人公，有愧于千千万万亟待拯救的生命，也有愧于我这颗生死未卜的心。

——作者题记

读者朋友，当你看到这份来自国务院的数据报告，一定会感到振聋发聩，触目惊心。

“心血管病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杀手之一。我国现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等待手术，而全国每年仅能完成四万多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建成，将为改善我国心血管的治疗作出贡献，给广大心血管病患者带来福音。”（摘自吴仪发给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开业典礼的贺词）

另据报导：中国每天有一万多人死于心脑血管、癌症等疾病。北京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中国现有四百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 1%，剩下那几百万心脏病患者将揣着“破碎”的心，日夜盼望着白衣天使能拯救他们的生命。但是，或因贫穷，或因昂贵的医疗费用，或因排不上号住不上院，或因庸医的误诊，使多少病人苦苦等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过早地结束了本该延续几十年的生命。而排不上号住不上院、交不起医疗费，多是那些没职没权没钱没关系的普通百姓，尤其苦了那些贫苦农民和下岗职工。

这种严重的供需失衡现象，深深地触动了一位医生的良知，他因此而做出的一次次惊人之举，像地震一般震撼着中外医疗界，震撼着千百万亟待拯救的生命，也震撼着中国亟待改革的医疗体制——

面对一个个乞求的生命，他不知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

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生命是美好的，但它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人都扼不住命运的咽喉。

1987年5月，春天带着不可抗拒的骚动与活力，从遥远的天际涌来，冲破坚硬的寒冷，把鲜活的生命撒向枯黄的世界。饱尝了严冬的寒冷与沙尘的北京人，踏着春色，漫步在华灯初放的长安街上，欣赏着绚丽多姿的夜景，享受着春天的馈赠。但在全国唯一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北京阜外医院一间门诊室里，却上演着司空见惯而又令人痛心的一幕。一位中等身材、精明干练、两眼蓄满善良与睿智的中年医生，被一群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及家属团团围住，一直下不了班。他就是两年前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三十八岁的主治医师刘晓程。

“刘大夫，听说你是佳木斯人。俺是鹤岗煤矿的。咱们是老乡呢。”一个又黑又瘦的下井汉子怀抱三岁的孩子，操着山东口音，跟刘晓程一个劲儿地套着近乎，“刘大夫，求你看在老乡的面上救救俺老婆，俺们再也等不起了。她都快不行了！刘大夫……”汉子说不下去了，低头呜咽起来。他身边瘦弱的女人用胳膊肘碰碰他，嗫嚅道：“要不俺不治了，俺回家。”却遭到汉子的一声训斥，“你不治就得死！你死了俺的两个娃咋办？呜呜……”下井汉子挖煤塌方砸断一条腿都不曾掉过泪，现在却被病老婆压得放声大哭。他一哭，女人和孩子也跟

着哭起来。

刘晓程刚想安慰那汉子几句，却被一个穿着破旧、满脸沧桑的中年农民打断了。

“刘大夫，俺把房子都卖了，还借了一万多元钱饥荒。俺爷儿俩从黑龙江跑北京两趟了，这次再手术不上，俺们全家就活不下去了！求你看在家乡人的面上救救俺儿子吧，他才十四岁。俺爷儿俩给你下跪了！”

“别别！千万别……”刘晓程急忙上前制止，但晚了，一老一小“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瘦得像铅笔杆似的少年瞪着满含泪水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刘晓程。父亲却发出一阵令人心碎的哭号：“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儿子吧！救救俺全家吧！呜呜……”

望着这对父子，望着这一张张求生的面孔，刘晓程的眼睛湿润了，一种深深的疾痛与同情，紧紧地攫住了他那颗虽然每天被病人揉搓却依然慈悲的心。他知道，这些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偏偏又患上这样那样的心脏病。他们卖房卖地拖儿带女，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整夜整夜地排队挂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但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苦苦地哀求他，给他下跪，不为别的，只为一张小小的住院单——一张求生的“通行证”。他何尝不想大笔一挥，给每人开一张入院单，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接受手术，痛痛快快地活下去？可他每天只能开一张入院单，一个月只有三十张的权力。一下午就要接待五六十个患者，许多病人都需要手术，他真不知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涯从没有难倒过他，可是面对一群向他哭诉的家乡父老，他却难过得不止一次地掉下泪来。他觉得自己有愧于做一名医生。

这时，药剂科的丁飞主任手拿一包方便面走进来，进门就嗔怪他：“刘大夫，都十点钟了，快吃点方便面吧！你天天这么折腾，早晚会被折腾死的！”丁主任看到刘晓程天天被患者“糊”得可怜，心疼得几次落下泪来。

可是，面对一群看病比登天都难的父老乡亲，面对一个个本应该尽快手术的心脏病病人，刘晓程却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离开。令他终生难忘的是那位二十七岁的姑娘。此刻，她就像死人幌子似的，瞪着一双美丽而无神的大眼睛，凄婉地望着他。

“你为什么不早来？”刘晓程问她。

姑娘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了，忙从衣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入院通知单，双手像捧着命根子似的，小心翼翼地捧到刘晓程面前，啜泣道：“我八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没有床位，大夫让我回家等通知，可我等了一年也没等到通知，实在等不了啦！”

刘晓程的脑袋“轰”的一声，忙接过那张已经被八年时光磨损出几处破洞起了毛边的入院单，看到上面赫然写着“1979年4月23日”，心里不由得发出一阵惊愤的慨叹：可悲呀！八年抗战都结束了，可一个心脏病患者却手拿入院单没有等来住院通知！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怎么能等得了八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大好的八年？八年，一个花样的少女变成了二十七岁的大姑娘，而一颗破碎的心却因漫长的八年而失去了治疗机会。现在，她的心脏已经无法接受手术了，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可她完全可以不死，完全可以活好多年，完全可以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可这一切，就因为八年的耽搁而变得永远不可能了。

这位来自黑龙江农村的姑娘并不知道刘晓程的内心，而是可怜巴巴地乞求道：“求求您刘大夫，让我住院手术吧。我实在等不了啦。我不想死，我才二十七岁，我已经等了八年啦！”

面对这双对生命充满渴求的眼睛，面对足足等了八年却不得不提前告别人生的家乡姐妹，刘晓程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用善意的谎言去欺骗她。他怎么能告诉她：“你不能手术了，你只能回家等死了。”他怎么能说出这种没有人味的绝情话？

他想：如果这些病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亲生父母，看着他们得的并非不治之症，只是因为住不上院而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提前告别人世，我该是怎样一番心境？该是何等痛苦？他心里忽然发出一阵悲愤的质疑：为什么天远地远初次来就诊的病人就已经是手术禁

忌症了？为什么还是手术适应症的病人又要争那张维系生命的小纸片？为什么得到了这张纸片的人还要继续等下去，甚至一直等到死？我这个医生再出这种门诊，再发这种毫无价值的纸片，还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误人性命的“罪魁祸首”？我是诚实善良的大夫，还是整天用谎言安抚病人及家属的“骗子”？

宁可再被毁灭一次，也要学习！

刘晓程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父母都是 1945 年参加革命的医务工作者。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父亲是佳木斯医学院著名的外科主任刘沛。刘晓程是姊妹五个中唯一的男孩儿。

1968 年，刘晓程下乡到宝清县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压抑的知青生活，过分的体力透支，使他得了肺结核，每天咳嗽，低烧不止。下乡的第四个年头，他提前返城了。

不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落实政策，刘晓程获得了一个工作指标，面临当工人和实验员的选择，犹豫再三，他走进了令人谈虎色变的“臭老九”行列，成为佳木斯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一名实验员。并非子承父业，他并不想当医生，他不喜欢整天跟生理不健全的人打交道。他从小最崇拜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但，正像马克思所说：当年轻人选择职业时，社会早已经为他决定好了。

实验员，就是洗刷各种试管和器皿，把兔子、青蛙、老鼠准备好，供大学生实验时使用。但工作之余可以旁听老师的讲课，这是刘晓程选择实验员的真正原因。一位在文革中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医生气得骂他：“你还要念书？吃一百个豆还不知豆腥气？”但对刘晓程来说，求知成了他生命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宁可因求知而再次遭到毁灭，也不愿浑浑噩噩地混下去了。他不相信中国会永远像现在这样知识无用，没有知识，一个国家靠什么发展？一个民族靠什么前进？

他一边工作，一边玩命地学习。初、高中学的是俄语，改学英语必须从 ABC 学起，晚间说梦话都叽里咕噜地背着英语单词。一年后，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 1973 年，医学院基础研究所满票通过，推荐他走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成为一名二十四岁的“工农兵”大学生。当他满怀鸿鹄之志跨进校门准备苦读时，却发现梦寐以求的校园，到处都充斥着声嘶力竭的政治口号，以及越来越离奇的“教育革命”，偌大的校园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1979 年，十年浩劫结束后，刘晓程决定报考研究生。当他一切准备就绪，手拿《招生简章》准备填写志愿的那天夜里，父亲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紧接着，结婚不久的妻子又因妊娠中毒症，怀孕七个月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

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一边是需要呵护的亲人，一边是大学学府强烈的呼唤，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他一连数天彻夜无眠。

“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你不要管我，今年你一定要考！为了学本事干事业，你能考到伦敦、纽约才好呢。那才是你对父母的最大孝敬！”父亲对守候在病榻前的儿子语重心长地说。

“你去考吧，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别惦着我。二位老人我会尽力照顾的。”从小同窗、一向贤惠善良的妻子洪依舒也一再鼓励他。

刘晓程含着泪，在研究生志愿栏里一连写下三个志愿：第一志愿，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阜外医院；第二志愿，阜外医院；第三志愿还是阜外医院！阜外医院是中国心血管病研究和治疗的最高权威机构，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心血管外科医生。

1979 年秋，三十岁的刘晓程以骄人的成绩，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成为一名心血管外科研究生。他发誓：一定要无愧于阜外医院和导师的录取，无愧于父母和妻子的支持，更无愧于自己的选择！

许多研究生同窗跟刘晓程一样，都经历过蹉跎岁月，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刘晓程更是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广博的医学海洋里没日没夜地搏击，连吃饭和睡觉都变成多余的了，只有学习才是生命中最需要的。听英语录音，一听就到凌晨四点，上课的路上，

要背会三十多个英语单词……他决心把空耗的时光夺回来。

三年后，刘晓程以出色的成绩完成学业，并留在阜外医院工作。1984年，阜外医院又破例提前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深造。

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不如你？

美国前总统卡特说：“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像牛顿、法拉第或爱迪生那样有伟大的发现，也不可能像米开朗基罗或拉斐尔那样有传世之作，但我们可以抓住平凡的机会并使之不平凡，进而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壮丽。”

澳大利亚很美，碧水，蓝天，风光旖旎秀丽。

但是，第一次踏上澳洲的刘晓程却无暇光顾这一切，第二天就走上了手术台，面临两台大手术，而且要给主刀医生当第一助手。

第一次走进亚布里斯班市查理王子医院心血管外科手术室，一切都是陌生的，金发、碧眼的医护人员；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器械；几位主刀医生各自不同的操作方式；叽里哇啦一句都听不懂的俚语、方言……更糟糕的是，他就像从慢悠悠的牛车上卸下来的一枚螺丝，忽然被拧到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上，一上来就得适应人家那种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丝毫不存在你是新来乍到给点时间让你适应一说。而且主刀医生盛气凌人，开口就训人：“拿镊子！不不！不是剪刀，是镊子！你懂不懂英语？不懂回去学会再来！”

嗨，别提有多狼狈了，当场他就出现了“文化休克”，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傻眼了，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当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按照手术惯例，主刀医生给病人开完胸，建立起体外循环，助手就该从患者腿上取完大隐静脉，递给主刀医生做搭桥术了。可他没有取完静脉，主刀医生立刻嗔怪起来：“太慢了！简直太慢了！”这使刘晓程越发手忙脚乱，大汗淋漓，不知所措了。

主刀的奥布来恩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刘晓程只是一名中国留学生，遭训斥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刘晓程来说，却像童年唯一一次挨父亲的皮带一样。父亲的皮带是抽在他的屁股上，而这次却是抽在他脸上，抽在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上。他发誓：“我就不信你们能做到的我做不到！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不如你？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技术学到手，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下了手术台，他急忙把主刀导师的操作程序全部记录下来，把剩下的静脉搜集起来，从护士长那借来手术器械，回到宿舍苦练搭桥术，设计出各种高难度的吻合方法，边缝边做思索，边画图……几个月下来，他不仅把四位导师不同的操作方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对四位导师的手术方案采长补短，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特手术方法。

白天，他要给四位导师当第一助手，常常忙得连杯咖啡都顾不上喝。一台手术下来，导师去喝咖啡，他却忙着写手术记录，填卡片，下术后医嘱，看下一台手术造影片子，没等做完，下一台手术护士又在叫他，“刘医生，手术开始了！”他一天最多跟过五台大手术，从早八点一直忙到晚九点，回到宿舍累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在一次主动脉瘤的手术中，患者突然大出血，奥布来恩博士竟然无端地冲刘晓程发起火来：“谁让你把着的（指血管）？”

“你让我把着的！”刘晓程早已受够了导师的傲慢与训斥，破天荒地顶了他一句，心里却愤愤地说，“你牛什么牛？不就是你们国家比我们国家富点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国家早晚会富起来的，早晚有超过你们那天！你说你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说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姐妹，其实你根本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是人，不是一条狗。你别张口就来训斥我！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导师也应该学会尊重人。今后，绝不许你再侮辱我的人格！”

血止住了，奥布来恩主动向刘晓程搭讪，刘晓程却不理睬他。

第二天上班，奥布来恩又主动跟刘晓程打招呼，刘晓程装做没听见。

奥布莱恩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权威与人格、傲慢与尊严的较量中，他心理开始失衡了，开口向刘晓程道歉：“对不起，晓程，昨天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接着又说，“晓程，今天你来主刀，我来给你当助手！”

刘晓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澳大利亚的法律严格规定，外国医生只能当助手，不能主刀手术。

“我让你做的，一切后果由我来负。”奥布莱恩说。

于是，就在这所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手术室里，中国医生第一次走到主刀位置，第一次打破澳大利亚严格而冷酷的法律，划开了“洋人”的胸膛……当刘晓程以熟练的技法，稳健而准确、轻快而严密地做完心脏搭桥术，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奥布莱恩没有想到这个多次被自己训斥的中国留学生，竟然有这样一手好功夫。

当晚，奥布莱恩请刘晓程共进晚餐。两人从此成为要好的朋友。

“晓程，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最优秀的中国人。”奥布莱恩向刘晓程举起酒杯，“我相信你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心外科专家。”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心外科专家，最令人敬佩的导师！”刘晓程回敬道。

奥布莱恩虽然傲慢，却丝毫不讲师道尊严。

一次，刘晓程发现奥布莱恩没有切开极容易被忽略的薄内膜就要开始做血管吻合，就急忙提醒了他。奥布莱恩连声道谢：“谢谢！太谢谢你了晓程。我的疏忽险些危及患者的生命。”

在这里，任何人的脸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是如何做好每一个手术细节，使手术最大限度地获得成功。几位导师还采纳了刘晓程提出的一些改良手术的建议，风趣地称它为“刘氏法”。导师们一切为了病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使刘晓程受益匪浅，成为他一生工作的典范。

从此，奥布莱恩不顾法律约束，不仅让刘晓程在洋人身上主刀，而且做一些连澳大利亚本国高资医生都轮不到的高难手术。一年内，刘晓程参加了六百多例手术，主刀完成五十多例，仅冠状动脉搭桥就做了二三十例，患者最高年龄八十三岁，无一例死亡或发生合并症。

刘晓程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及高超的医术，终于赢得了同行们的爱戴与尊重。留学一年期限到了，奥布莱恩主动带刘晓程去州卫生主管部门打延期，让他再研修一年。

1985年，国际心脏外科会议在澳大利亚召开，走上讲台，代表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作学术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优秀的炎黄子孙刘晓程。他流利的英语、精湛的发言，令全场震惊，从而成为第一个享此殊荣的外国人。

留学期限到了，奥布莱恩让刘晓程把家属接来，一切手续由他办理。他说这里的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对刘晓程今后的发展大有益处。

在查理王子医院，一名普通医生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在阜外医院，一名主任医生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千元人民币。而且，中国留学生陪读热方兴未艾，多少人都梦寐以求地想借此机会搭上出国的列车，从而开始另一番人生之旅。从阜外医院一起来澳洲留学的医生已经把家属接来了，劝刘晓程也如此效仿。可是，刘晓程却忘不了童年时代，父亲多次给他讲过钱学森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报效国家的故事。他舍弃不掉对祖国、对家乡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眷恋。

一次，他跟同事到澳大利亚花城土温巴山去旅游，看到山顶有一只标着世界各国方位的坐标，就面向自己的祖国，迎着落日的余晖，唱起了思乡曲：“乡间小路，引我回家。那个地方，我永远属于她……”唱着唱着，一行思乡的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他知道，他的心永远属于那个虽然贫穷却不能忘怀的祖国，属于那个无论多么优越的条件都无法取代的母亲！

“导师，中国的病人太多，太苦了，那里非常需要医生。如果我们学成了都留在国外，那谁去解救他们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里的条件虽然优越，

但并不需要我。我的祖国虽然很穷，但她需要我，我也需要她。”刘晓程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

奥布来恩听了很受感动，说：“我很理解你，也很赞成你的选择。回国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需要学什么欢迎你再来。我的邀请永远对你有效。”

随同刘晓程一起归来的，还有整整两箱子国内奇缺的体外循环插管和接头。在查理王子医院，刘晓程看到在国内奇缺的体外循环插管和接头，用过一次就丢进了垃圾袋，而在国内用过几百次都舍不得丢掉，就对同事们说：“我的国家还很穷，可不可以请你们别丢掉这些东西，让我攒起来带回国去用？”同事们不但没有耻笑他，反而帮他将这些东西一根根地收集起来，刷干净，消好毒，替他保存起来。

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看到这两箱东西，高兴地喊起来：“噢，太好了。这可解决大问题啦！”

“我那乡土哟，我恨你，我不能不爱你！”

这是巴金老人多年前发出的感慨。

像许多海外归来的学子一样，刘晓程怀着满腔热血扑向朝思暮想的祖国，扑向自己的事业。他的心就像喷薄欲出的朝霞，充满了激情与渴望，渴望把自己所学的医术全部报效给祖国，报效给民众，拯救那些亟待手术的病人。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面对阜外医院原先那种慢节奏、低效率的工作环境，就像当初到查理王子医院突然面临那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环境一样，他同样感到不适应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颗日夜运转磨得锃亮的螺丝，忽然被拧到一辆慢悠悠的牛车上，无论怎样卖力气都快不起来了。

他感到痛苦而茫然，一系列的问题常常叩击着他彻夜难眠的心：阜外医院每年仅能做一千例手术，排号却排到了一万四千例。按照现有的速度，许多病人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能手术。全国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有三百多万，而全国每年仅能做手术的不到百分之一。那三百多万患者不知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手术，而绝大多数病人一直等到死都手术不上。这种尖锐的供求矛盾何时才能解决？在澳大利亚，他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回到国内，他这位主管四个病区的主治医生一年只能做八十八例。全院上自院长下至年轻医生，都想多干工作，多救病人，可都觉得有劲使不出来。这到底是为为什么？

1987年春节期间，阜外医院派刘晓程带队到黑龙江牡丹江市开展心脏手术。他看到家乡十几万心血管病人处在投医无路、求治无门的水深火热之中，感到很痛心。一天，一个农民带着患有严重先天性法乐式四联症心脏病的十三岁男孩，顶风冒雪找到刘晓程，说他带着儿子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手术不上，求刘晓程救救他儿子。可是，刘晓程带队出来时阜外医院有指示：到条件差的地方开展心脏手术，不要做复杂的，以免发生意外。刘晓程留下父子俩的地址，劝父子俩先回去等候消息。父子一走，刘晓程立刻电话请示阜外医院的导师郭加强院长。郭院长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说：“虽然有风险，但我还是有把握的！”郭院长说：“那你就做吧，但一定要慎重，要预防术后并发症。”

于是，刘晓程不顾外面风雪交加，乘着牡丹江励副市长的三菱吉普，立刻去追赶那对父子。吉普车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几次险些翻到沟里，晚间九点多钟，终于在距离小说《林海雪源》所描写的“座山雕”威虎厅不远的偏僻山沟里，找到了父子俩的家——一间东倒西歪、窗户上钉着塑料布、房顶压着厚厚积雪的破草房。屋里除了几张瘦骨嶙峋的脸，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呼呼啦啦地摇曳。直到许多年后，刘晓程都忘不了这个“家”。

半夜十二点，当父子俩乘火车，搭马车，艰难地跋涉了十几个小时，雪人似的回到家里时，眼前的情景就像一盏灯，猛然照亮了爷儿俩几乎冻僵的心，也照亮了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家庭。

农民汉子一把抓住刘晓程的手，老泪纵横地哭喊道：“刘大夫，你是俺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俺们做梦都没想到啊！”

这个五口之家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孩子有病更是雪上加霜，四处磕头作揖借了几千元钱，可都扔在铁道线上了，两次去北京手术都排不上号。农民汉子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次想一头撞死在北京大街上，可转而一想，自己死了一家老小怎么办？现在，北京来的大夫却顶风冒雪找上门来了，来接儿子回去手术，天底下哪能有这么好的医生？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刘大夫，你这北京来的专家，用市长的车来接俺儿去做手术，俺不是在做梦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晓程的父亲冒着坐牢的危险，顶着造反派的压力，抢救过被医生放弃、濒临死亡的农村孩子。今天，刘晓程担着手术风险，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跑了上百里路，为了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孩子。因为他知道，在这极其偏僻、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人烟的山沟里，一个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如果不能尽快地接受根治手术，那将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次巡回医疗不能为孩子手术，这孩子就不知会等到哪年哪月了。

刘晓程连夜把父子俩接回医院，第二天就为孩子成功地做了手术。这次巡回医疗，他在牡丹江成功地做了八台心脏手术。

巡回医疗很快就结束了，可是，黑龙江十几万心脏病同胞求医无门、备受煎熬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一直蹂躏着刘晓程的心。

回国两年，他的内心苦苦思索了两年，斗争了两年。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思考，这位海外归来的学子不仅斗胆发出了天问：造成这种日益尖锐的供求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穷吗？

不！我们不单单是经济和科技落后，还有封建思想残余及诸多因素造成的低效率和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存在着的内耗！这种内耗大量地表现在扯皮、推诿、有劲不使，或有劲使不上的工作上。在大城市科研单位里死争死挤，却难以发挥作用的人，何止一二？有了技术人才，宁可自己封存不用，也不肯放走的大单位，何止一二？教了三年打铁，临出徒才放手让他打一把炉钩子的师傅，又何止一二？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可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难啊，我们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少又‘太多’了！

“谭嗣同为了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甘愿献出生命。他在断头台前从容地喊出了‘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千古绝唱。谭嗣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多少人感慨不已。资产阶级革命家为国为民尚有如此壮烈之举，我们 20 世纪的共产党人就不能牺牲点儿什么，来治国有目共睹的通病和顽症吗？”（这段激越之词，摘自 1993 年刘晓程以全国优秀中青年干部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向中直机关和科研院校代表作的报告《人生蹉跎，丹心一片，为国为民，不虚此生》。）

这番令有识之士感慨万端的肺腑之言，无异是对中国医疗体制与传统观念的挑战。但是，他太渺小了，他仅仅是一名留学归来、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医生。他所能左右的仅仅是他自己，而非一个沉寂几十年、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国家医疗体制。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我为什么不能回到家乡，为备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乡亲建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回家乡，为家乡父老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

可他觉得，这样做太对不住妻子和儿子了。他和妻子结婚八年分居了六年。现在，妻子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邮电医院。孩子被安排在师资雄厚的大木仓小学。阜外医院刚分给他两室一厅的住房，一家三口终于在北京落户了，刚刚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可现在，他却要亲手砸碎它……一想这些，一种深深的自责噬啮着他的心：我有什么权力毁掉这一切？又有什么资格把她们母子再拖回到前途未卜的动荡之中？

四万：四百万的牵挂 2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刘晓程在与妻子彻夜长谈。

“看到家乡人倾家荡产地跑到北京来找我，看着他们走投无路、求医无门的样子，我常常觉得自己很无能。你想想，如果那些人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眼看着他们住不上院，排不上号，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你说我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刘晓程长叹了一口气，“唉，老百姓看病真难哪。尤其咱们黑龙江，死冷寒天，心、脑血管的发病率均居全国之首……”

妻子洪依舒瞪大眼睛幽幽地望着他，许久不说话。

她理解晓程内心的痛苦。她经常看见他夜里辗转反侧，哀声叹气。可是，看看这个来之不易的家，想想眼前这令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她实在不忍心丢下。可她太了解晓程的个性了，只要他认准的事，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毫不退却。文革期间大串联，一群学生豪言壮语要步行去北京见毛主席，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晓程和另一名男同学，一双脚都走烂了。

刘晓程见妻子久不言语，就说：“我知道你为我付出得太多了。这样吧，你和孩子留在北京，我一个人回黑龙江。”

“别说了。”妻子打断了他，“从我的工作和孩子的教育考虑，我确实不想走，可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回去？我还是带着孩子跟你一起走吧。”

“……”刘晓程一时语塞，一把搂过这位行动永远胜过语言的妻子，久久地拥在怀里。

为了慎重，刘晓程专程回佳木斯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父亲，他心中永远的太阳！

克林顿曾说：“母亲告诉我永远不要放弃，不要屈服，不要停止微笑。无论发生多么可怕的事，第二天一早就起床，母亲都会微笑着站在我面前，她从不把痛苦露给别人。”

克林顿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刘晓程则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父亲刘沛是佳木斯医学院享誉四方的外科专家。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不知恩泽过多少人。老人家过八十大寿，佳木斯市委书记带着市委、市政府的“五大班子”去为老人祝寿。1988年，刘晓程和父亲同时享受国家首批政府特贴。

父亲对晓程的管教很严。一次，父亲得知晓程从家里悄悄拿了两元钱买栗子吃，又对母亲说谎，第一次用皮带把晓程的屁股抽成了紫茄子。七岁的晓程却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做人要诚实！不许说谎，说谎是万恶之源！”

在晓程的记忆里，父亲每天早五点就去病房查房，父亲常常蹲在厕所里观察病人的大便，以便做出准确的诊断。晓程不记得父亲让他给吃不上饭的病人送过多少次饺子，也不记得父亲掏钱给过多少贫病交加的病人，不知父亲从家里给病人偷偷拿过多少鸡蛋，更不记得多少病人感激涕零地跪倒在父亲面前，他只记得病人看到父亲眼里所流露出的目光——那种拜见上帝般的感激与崇敬。这给他幼小心灵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多年前，一位市委书记夫人乳房上长了一个良性瘤，要出省治疗，让父亲刘沛出诊断。父亲却说：“用不着出省，没必要花那份钱！”一句话把第一夫人顶了回去。

文革期间，一个罕见的患先天性中肠旋转不全的农家孩子，被医生放弃治疗，告知家属准备后事了。孩子父母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正悲恸欲绝，被打成“日本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在清扫垃圾，急忙奔过来说：“千万不要放弃孩子，我能治！”

造反派立刻质问他：“你敢承担这孩子手术的后果吗？”

父亲说：“一切后果由我来负！”

这时，忽然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打倒日本特务刘沛！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刘沛！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

就在一片“打倒”与“灭亡”的口号声中，身陷囹圄的父亲担着可能毁掉自己一生声誉，甚至可能因“陷害”革命群众而被判刑、被枪毙的风险，脱掉清扫服，匆匆走上久违了的手术台……孩子得救了，父亲又回到“牛棚里”继续清扫厕所。

“名誉与生命相比，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在毁誉与病人的生命面前，必须勇敢地选择后者，这才是一个好医生。”这是父亲的人生信条，也是他对儿子的训诫。

父亲不媚上、不卑下，博爱济贫，珍爱他人生命的做人准则，成为刘晓程一生的楷模。文革期间，刚学会游泳的晓程不顾淹死的危险，跳进松花江救起一名遇险的教师。当了医生以后，他更是处处以父亲为楷模，以母亲的遗训为座右铭，严格自律。母亲七十三岁那年，因患严重风湿病连筷子都拿不住，却颤抖着双手为儿子留下一条遗训：“医乃仁术，好自为之。”这条遗训一直挂在晓程的办公室里。

“风萧萧兮塞外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父亲得知刘晓程决定回黑龙江创业，竟说出一番令晓程大为感动的話。

“当初我让你出去闯荡，是为了让你多学本领，现在我像当初一样支持你回来。你应该把学的东西为家乡父老贡献出来。”

得到父亲的支持，越发坚定了刘晓程回黑龙江创业的决心。

此刻，中国正处在“出国热”的大潮之中，多少海外学子都挖空心思留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当然，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人各有志，中国封闭得太久了，耽误得太久了，人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不为刘晓程逆流而动，选择艰苦人生的勇气而叫好，不能不对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而肃然起敬。

无情未必真豪杰。

1987年5月13日深夜，刘晓程来到儿子床前，抚摸着熟睡中的儿子脸蛋，轻声道：“儿子，爸爸也许对不起你。爸爸没权力剥夺你现有的条件，等你长大以后也许会埋怨爸爸，到那时爸爸再向你解释吧。”

经过二年的痛苦挣扎，一颗崇高的心灵终于得到了解脱。他的心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旷达与坦然，就像暴风雨过后的海，浩瀚而平静，又像鼓满风帆的航船，期待着新的远航。他开始俯案疾书，给院领导写《请调报告》。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请调报告》，而是一次自我心灵的剖白，一张人生价值的答卷，一份向旧医疗体制宣战的檄文——

二十岁时，我为人为什么活着这个严肃的问题而苦恼过，求索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心中的希望之光泯灭过，我也曾灰颓过，消沉过。但我终于自拔了，振作了，并在坎坷的道路上奋斗了二十年。而今，作为一名80年代的中年知识分子，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又为怎样度过余生这个严肃的问题，而苦苦思索，认真探求。经过人生的苦、辣、酸、甜，我真正地认识到，人为了自己活着，就会永远感到空虚和不满足，而为了人民去工作和奋斗，就会感到充实。这种思索与探求，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使我抛弃了小我，去追求人生的真谛。

到阜外医院八年，我由一名基层医院的普通医生，成长为一名心血管外科主治医生。回想八年来的一幕幕，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难平，对给予我一切的阜外医院和我的启蒙导师，心中充满了对亲生父母般的赤子之情，有着永远不能忘怀的感激与眷恋……

我国现有三百多万心脏病病人等待着手术，而全国每年仅能完成几千例，存在着严重的供求矛盾。心血管疾病虽然不像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那样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却毫不留情

地吞噬着千万人的生命。我由衷地赞同、支持我院当前所搞的心血管外科临床协作和建立全国培训中心，但也清楚地看到，当前这种协作方式达到真正奏效的难处……我觉得，各地方搞心血管外科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心血管专科医院。像阜外医院、上海胸科医院等有实力的大医疗中心，应向全国搞协作和培训，不应像蜻蜓点水，飞走后又是一潭死水；而应像一架播种机，到祖国的沃土上去播种……舍出几个卒子，甚至几员大将，必将走活一盘死棋。

“黑龙江是我的故乡，那里因气候寒冷，经济文化落后，先后天心脏病的发病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数，十几万病人处在投医无路、求治无门之中。我决心抛弃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离开培养我的阜外医院，为家乡水深火热中的父老兄弟筹建一座心血管病医院，为中国的心血管外科事业开辟一条新路。我深知，自己的精力有限，时光有限，业务水平和行政能力也有限，也许今生今世难遂夙愿。但我情愿做铺路石，做人梯，让后人继续去开拓，去登攀。我的离去，对阜外医院的损失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却有可能改变家乡千万人的命运。我向领导正式提出，请把我当做第一粒种子播下去吧！”

十页报告，一蹴而就。

他最后写道：“心底无私天地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的心境从未像现在这样开朗，头脑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晰，决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定。风萧萧兮塞外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写得有几分悲壮，几分苍凉。

这份在阜外医院建院以来从未有过的《请调报告》，就像一枚炸弹，在医院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猜测着刘晓程调离阜外的真正原因，是领导对他重视不够，还是家属安排不周？仔细一想，阜外医院对他不错，送他出国留学；破格提拔他为四个病区的负责人；刚分给他两大居室的住房；他妻子被调到邮电部医院……而且在学术上，他成功地完成了全院第一例正后壁梗后室壁瘤切除术并搭了两支桥；他使术后停跳四十五分钟的病人心脏复苏；他参与了国家“七五”攻关重点科研“冠心病心肌血重建方法”的研究和协调工作；他建立起液氮保存的同种生物瓣实验室，并将该瓣首次应用于临床，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一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基金……

“晓程，是工作不顺利，还是院领导考虑不周？院领导一直很器重你，希望你不要走。”院党委书记陈德林同志找刘晓程谈话。

“告诉我，晓程，到底因为什么？”郭加强院长是刘晓程的研究生导师。刘晓程是郭院长最得意的开门弟子，两人私交甚好。郭院长直言不讳地问道。

“导师，黑龙江是心血管病的高发区，十几万心血管病人急需手术，那里更需要我。我准备在黑龙江建一座心血管病医院！”

“噢，原来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待遇问题……”郭院长的心里感到一丝安慰，“我看你还是把关系留在阜外，先回去干一段看看再说，觉得不理想再回来嘛。”

“谢谢导师，可我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否则会动摇我的意志！”

“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院领导不放，刘晓程只好去找曾担任佳木斯合江地委书记、现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曹志同志“说情”。曹志给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写信说：“刘晓程立志到下面去，为人民解除病痛，这种精神应给予支持。”

看到刘晓程去意坚决，郭加强院长只好忍痛放行。

“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勉强留你了。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你导师的大门永远冲你晓程敞开着！”

“谢谢导师的关怀！”

临行前，一群收入微薄的护士凑钱请刘晓程到烤鸭店去吃烤鸭，约好每人送给他几句话，可到了餐桌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只有一片呜咽声。中层干部送别会上，一位副主任说：“晓程，你想到了我们大家想过的事，却做出了我们没有勇气做的事。”后来，这位副主任果然

去了海南。一群研究生把刘晓程拉进宿舍，几杯薄酒为他饯行：“晓程你先走，我们为你壮行。这条路走对了，我们毕业后也回家乡！”

院器械处给刘晓程送来大量的器械，并把空压机换了马达，怕他用坏了没处修；麻醉科主任给他送来一大袋麻醉用品；历来有“把家虎”之称的监护室护士长，破天荒地送给他一堆难买的小器械；药剂科的丁飞主任眼含热泪叮嘱他：“今后不管什么紧缺药，只要阜外有的就有你晓程的！”病房的病人听说他要走，纷纷爬起来为他送别。

人们赞扬刘晓程的妻子洪依舒很伟大，竟然舍弃北京优越的环境，跟丈夫回黑龙江去受苦，这在一般女人是做不到的。刘晓程也觉得妻子很了不起，但在临行前一天晚间，洪依舒看到昨天还温馨流溢的家，忽然变得冷冷清清一无所有了，她哭了。他拥着她在空空荡荡的屋里站了很久。他知道，这个家再也不属于他们了。

世界因为他而改变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你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你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1987年6月14日，刘晓程起程回黑龙江。

决心回黑龙江之后，他的首选地是故乡佳木斯。春节放假期间，他曾找到市政府领导谈，说他要回佳木斯建一所心血管病医院，为家乡父老作点贡献。这位领导却以资金紧张为由，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之后，他来到距离佳木斯很近的牡丹江市。牡丹江的东安医院曾派医生到阜外医院学习过心脏手术，他曾带过他们的进修生。1987年春节期间，他带着巡回医疗队就在东安医院做过八台心脏手术。这次，他向牡丹江市政府领导说明了来意，立刻受到市政府领导的欢迎，并任命他为东安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兼院长。就这样，以美丽的镜泊湖著称的牡丹江市，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这位赤子的到来。

然而，随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到来，一些流言飞语却像空气一样悄悄地弥漫开来。

“他肯定是在北京干不下去了，要不从国家大医院跑到这大集体医院来干啥？”“听说在镜泊湖给他盖了一幢别墅呢。要不，他从北京跑这穷地方来图希啥呀？”

东安医院是一所区级大集体医院，小日本侵略中国时盖的，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早已经老掉牙了。墙壁一碰就掉白灰，地板使劲一踩就会陷下去。全院仅有两千平方米房舍、七十张床位，却有二百多名职工。医院穷得叮当响，负有几十万元的外债，没有像样的麻醉师，没有得力的助手，没有像样的器械……刘晓程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难怪老百姓要问：刘晓程来牡丹江到底图希啥？

可是，刘晓程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终于扔掉一切束缚，可以甩开膀子干了，第二天就走上了手术台。就在这所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医院里，就在这间用竹竿支起塑料布、用来接住屋顶剥落的白灰及缓霜滴水的手术室里，靠几位仅受过初级训练的医护人员协助，他一台接一台做起了人类最先进的肝脏手术，一周就完成了十几例。

这里还经常停电，一停电体外循环机就停了，只能用手摇泵继续手术。一次，《健康报》的两名记者来采访又遇到停电，从未见过心脏手术的记者用颤抖的手擎着手电，为刘晓程照明继续手术。过后，两名记者带着一群患者家属去找市长“请愿”，市长特批为东安医院增加了双路电，这才解决了停电问题。

牡丹江能做心脏手术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的心脏病患者纷至沓来。小小东安医院原来门可罗雀，现在却一下子火爆起来。但刘晓程深知，即使他长出三头六臂日夜不停地手术，也远不能解决医患之间严重的供需矛盾，必须尽快培训出一批能独当一面的心外科医生。可是，医院要钱没钱，要人才没人才，要培养出一批心外科医生，谈何容易？

但是，在刘晓程眼里，一切困难都只不过是脚下的沙砾，人生的道路就是由诸多沙砾组成的。他一边手把手地教年轻医生手术，一边四处抽调人才，一边游说各级领导筹建心血管病医院。他教诲年轻人：“你们这些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要让自己尽快成熟起来！拿破仑说，